

1217 俱乐部 年度书系

Topic

杨早 萨支山 编

话题 2010

把个性化的思考留给历史

为什么是汪晖？

国产仙师李一

少林寺有多少和尚？

多棱镜中“曹操墓”

“蚁族”进不来，富士康工人回不去？

韩寒、韩寒现象

“二胎教授” 杨支柱的行为艺术

《非诚勿扰》复写时代

《孔子》，向权力致敬

“善款门”：自媒体打蒙章子怡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1217 俱乐部 年度书系

杨早 萨支山 编

话题 2010

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话题 2010 / 杨早, 萨支山主编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1.1

(1217 俱乐部·年度书系)

ISBN 978-7-108-03627-8

I. ①话… II. ①杨… ②萨… III. ①社会问题—研究—中国—2010 IV. ①D66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60130 号

责任编辑 卫 纯

封面设计 罗 洪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35 毫米 × 965 毫米 1/16 印张 21

字 数 245 千字

印 数 0,001—9,000 册

定 价 29.80 元

作者简介



杨早 1973 年生于四川富顺，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。现任职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，近年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舆论史与文化史、当代文化研究等。著有《野史记：传说中的近代中国》、《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》等著作。



萨支山 1966 年生于福建福州，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结业。现任职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，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，关注左翼文学及 50—70 年代文学。主要著作有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》（合著）。



施爱东 1968 年生于江西石城，中山大学文学博士。现任职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，研究方向为民俗学与民间文学、俗文学，学术论著主要有《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》、《倡立一门新学科——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鼓吹、经营与中落》等。



黄永 1969 年生于北京，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前驻北京记者，资深外媒记者、影视制片。曾在《时代》周刊发表封面文章：*SARS——What Did Beijing Know? SARS NATION* 等。



颜浩 1975 年生于湖南株洲，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。现任职于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，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与舆论史，近现代城市文学与文化等，学术论著主要有《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：1920—1928》、《新文艺和文学遗产：闻一多演讲集考释》等。



张慧瑜 1980 年生于山东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。现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，研究方向为中国电影史和当代大众文化，近期发表有《“被看”的“看”与三种主体位置——鲁迅“幻灯片事件”的后（半）殖民解读》、《弥合断裂与暴露伤口：关于“建国六十年”和“改革开放三十年”的两种历史叙述》等。



刘玉宇 1973 年出生于广东梅州，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。现任职于中山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，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理论和比较文学，曾发表论文《爱米丽的“同谋”》、《从〈瓦尔登湖〉中的儒学语录看梭罗的儒家渊源》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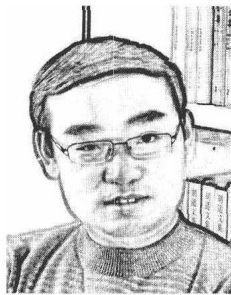
刘焜 1972 年生于陕西西安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。现供职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，研究方向为金属技术史。发表论文有《殷墟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技术演进》、《西汉日光大明草叶纹镜范的科学分析》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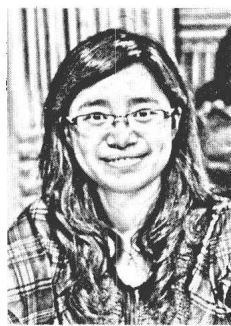
李芳 1981 年生于江西赣州，中山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。现供职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，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戏曲、俗文学。



段美乔 1974 年生于四川绵阳，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。现任职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，研究方向为现当代诗歌、40—70 年代转折期文学与文化研究。曾发表论文《论 1946—1948 平津文坛“新写作”的形成》、《“工作而等待”：论 40 年代冯至的思想转折》。



季剑青 1979 年生于安徽，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。现供职于北京市社科院文学所，主要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民国北京城市文化研究，发表论文有《“实际批评”的兴起——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的学院文学批评》、《周作人的“新的启蒙运动”》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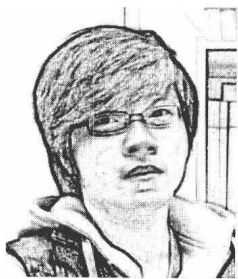
倪咏娟 1981 年生于上海，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。现任职于商务印书馆。



于闵梅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后。现任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。著有《灵韵与救赎——本雅明思想研究》、《异向共建——梁启超、王国维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》、《谁背叛了谁？——符号的象征与现代女性的身体》等。



罗鹏燊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在校学生，后进晚辈，常一知半解，只好多多参加读书会。



金浪 1982 年生于重庆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在读博士生。研究方向为现当代美学与文论，曾发表论文《“80 后”诗歌的谱系与身份焦虑》、《崇高美学与后发现代性国家的文化问题》等。

2010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

杨 早

有人在微博上发起：咱们也学日本，选一个年度汉字出来吧！

于是有人说“乱”，可是哪一年不乱啊？有人说“拆”，这个字倒是猛，有一定代表性，但也只有一定的代表性，七七八八别的方面咋办呢？

我的选择，是一个“信”字。“信”当然也不能代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可咱们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。回顾 2010，重中之重，浮现于心中的，还是一个“信”字。

诚信之丧

汪晖、唐骏、禹晋永、“曹操墓”、孙见坤……这样一些名字，在 2010 年的中国，意味着什么？

他们都因“真伪”问题而备受质疑，他们都是被非专业公众质疑的专业对象。

“专业”并不是万能的避水符，汪晖的注解，唐骏的学历，要说全无问题，恐怕人心不服。同样，“曹操墓”无论古物真假，孙见坤无论

学问高低，以它的公布、运作程序，局外人当然会疑虑重重。

纠结之处在于：这些事件的定性，确实不是仅凭舆论倾向或媒体争论就可以尘埃落定。汪晖的学问究竟有无价值，他的写作纰漏是否构成抄袭，肯定也必须成为一种巨大的争议议题，将其轻易地化约成诸多“学术腐败”之一例，或简单解读为无数“政治斗争”之一种，只能将讨论推入无解的死角。

而唐骏的造假与成功，看似之间并无绝对联系。考虑到唐骏的前雇主比尔·盖茨大学未毕业，在微软的前任吴士宏也只是护士自学成才，唐骏的学历造假，恐怕只能算他在中国社会变身成功导师与人生榜样的一贴催化剂。而由此牵扯出“西太毕业生”群体，更是说明“洋学历”是中国式成功人物的配方里何等重要的一味主药。

一般而言，舆论总是支持个人与体制的抗争，尤其在偏才怪才受到“一刀切”规则的限制之时。但在孙见坤特招事件中，很多人认为比起照顾“天才”，规则更重要：如果给孙见坤开了方便之门，后面的条子生、面子生就挡不住了——这也是陕西省招生办的理由。

对于以上诸事，乐观者认为中国社会的规则意识正在成熟，较之名气大小、地位高低、是否弱势等因素，公众更相信规则一以贯之，人人平等。我则认为，这些是中国各界，尤其是从前被视为信誉成本最高的学术界、商界，遭遇到了空前的诚信危机。

正是因为对这些高端职业共同体内部的伦理规范失去信任，媒体/公众才更愿意相信字词的比较、文凭的真伪乃至分数的多少，这些看上去无可置疑的标准，而且将这些标准放大成唯一的、全面的评判法则。换句话说，公众只相信“常识”，不相信“专业”。

这条法则毫无例外地体现在“曹操墓”发掘事件中。大家见过太多的地方政府借鸡下蛋，搭台唱戏，而“曹操墓”所在地政府这次确

实人未见锣鼓先闻，急吼吼地宣布、论证、搞规划，更让旁观者相信这是一场官员与学者的赚钱大戏。于是说真说假，本是事实问题，突然就变成了道德的高峰低谷，真相则在争议声中日益模糊。

一向讲求诚信的学术界与商界尚且如此，遑论其余的各行各业，一句“中国人是互相投毒的民族”道尽民众心中的狐疑与辛酸。圣元、伊利，为何同行的抹黑总是效果显著？而太多的流言与迹象让那根怀疑的弦总绷得梆紧。总的来说，职业共同体普遍的伦理失范，让内外人等对负面传闻总是喜听轻信，而对正向的宣传与辩解满腹疑虑。因为除了那点可怜的“常识”，以及同样无法让人深信的法规监管，中国公众实在没有可依赖的东西了。

公信之衰

在网络上一般被称为“ZF”的组织，公信力到底如何，恐是人人心中一杆秤。“曹操墓”的真假认定，如果不是地方政府的强势推动与高调宣布，“认真派”的学者何至于一开言就陷于道德劣势？

热议“荆州捞尸”事件，舆情对于捞尸行业的缺乏良知、唯利是图多有谴责，但一谈到监管，声音立即分裂。许多人认为当地政府倘若介入，只会增加寻租空间，导致已浑浊的水更加浑浊。

中国的城管，已经成了某种恒定的被谴责对象。隔三差五，总是有图片、有消息传播着这样那样的城管虐民新闻。在世博会上被3D化用来代表中国形象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却因一幅名为《城管来了》的改作再次闻名天下：画面上，张择端笔下的生动人物四散奔逃，留了无数货担、物事、衣帽，偌大州桥，立成无人之境。

与城管齐名的是拆迁办。几年来，拆迁的惨剧屡屡上演，也屡遭

谴责，“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”的典故世人尽知，然而拆迁事件的惨烈程度却日渐上升，从武汉农民自制土炮反抗拆迁队，到北京饭馆聘请前拆迁队长来应对强拆，再到江西宜黄的集体自焚、机场女厕攻防战、微博上访，拆迁反映出的动辄以死相拼与矛盾不可调和，让人惊诧于对立双方的极端对抗。2009 年底、2010 年初的几部好莱坞大片如《第九区》、《阿凡达》也居然被中国观众寄托了“拆迁想象”而与当下现实缝合，说明“拆迁”已成为国人心中一大痛事。

直到署名宜黄官员的《强拆出一个新中国?》发布，以及学者于建嵘被江西万载县委书记训斥“没有强拆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”，我们才在一边倒的舆论声势中，读出地方政府强拆背后的发展逻辑。一处两处，或许是礼崩乐坏人心沦丧，全国普遍如此，恐怕要寻找人欲背后的制度根源了。

在今日之中国，民间舆论虽云孱弱，但并不缺乏自我净化与自我反省的能力。然而一旦政府部门以强权态势介入，适足以造成舆情的逆转。

速配交友节目早已风行，江苏卫视热播的节目《非诚勿扰》的变化在于更快速，更直观，也更狠辣。它要让你看到戏剧性的冲突与交锋，看到嘉宾们在台上说出生活里无论如何不便当面启齿的辛辣言辞。它把相亲大战中两性背后的恶谑与轻蔑，让女嘉宾用最直接的方式当众呈现。她们表面的强势似乎颠覆了性别的秩序，然而短短 20 分钟内，她们灭灯与否依据的因素，除了长相，就只能是经济条件、个人风度。这种强势否定背后的指向，仍是在肯定男性社会的强势资源：更多金，更英俊，更有魅力。

《非诚勿扰》引起了道德批判的声浪是很正常的，也是社会自我反省的表现，然而一旦监管部门要求节目组整改，它立刻在“政治不正

确”之外，又添上了政治过分正确的毛病。自整改之后，《非诚勿扰》的观众该多分裂啊，看一个戳穿主流道德面具的节目，夜夜弘扬主流道德。

相声演员郭德纲与媒体的争端是另一范例。郭德纲之徒打人骂记者，原本已经引起媒体公愤，然而德云社被封杀的消息一传出，郭德纲转瞬变成了被有关部门打压的弱势群体，“挺郭”的声音此起彼伏，虽然德云班主也不是什么英雄烈士，认错复出难免，但此事件的实质演进，是监管部门替郭德纲完成了一次危机公关。

“羊羔体”和“梨花体”一样，是作者的身份将这些诗作置身风口浪尖，奖项与级别上镌刻的“国家”字样，让车延高与赵丽华都被无形中剥离了诗人身份，被放在了政府腐败的大图景中被严厉解读。公信之衰，让整个社会处于心物的极度分裂，一方面，绝大多数人不会拒绝体制中的名位与利益，另一方面，被公开的体制身份却总会成为某种原罪，“赢者输”的法则在中国获得了如此奇妙的转化，恐怕原创者布尔迪厄也始料未及。

迷信之盛

这一年，走过了十年打假路的方舟子亮相频频，他和他的同道者，高举“科学”与“真相”的大旗，一次次将祛魅的锋刃刺向各类偶像，李一、张悟本、肖传国、唐骏、禹晋永……方舟子的打假对象不再限于科学界，他成了文武昆乱不挡的全能警察。

鲁迅有句名言：“伪士当去，迷信可存。”方舟子反对的，几乎是一切层面上的“伪士”，学术抄袭，经历造假，伪科学，神道设教……被他刺中的偶像们，有些轰然倒塌，有些摇摇欲坠，有些安然无恙。

方舟子自己，收获了一把飞锤，几道伤痕。有人将他视作斗士，有人把他看作乱源。

很多人提到方舟子的“狂热”与“偏执”，其实，方舟子何尝不是某种迷信的信徒？在方舟子的身上，有时很难分清是科学精神，还是科学主义。不过，他怀着他的偏执与狂热，成为这个充满迷信与狂热的国度，最大的一只夜枭。

中国社会爱迷信，迷信养生，迷信神秘，迷信励志，迷信权威。当“迷信”自守于其自在的领域，它未尝不是信徒的镇痛药与兴奋剂，承担着世俗社会的黏合与宣泄功能。但迷信的施受双方一旦膨胀，一旦越界，它就会变成对旁人的某种压迫与干扰，甚或与强权与私欲四手联弹，完成对民众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双重宰制。

国家形象、传统文化、社会精英、原创思想、科学精神、环保低碳、草根权利……这些美好的字眼，都容易变作各类迷信华丽的外袍。这些外袍，在这个社会，总能找到适合它们的衣架，适合它们的展台。民众需要信仰，它们提供信仰。当然，每一座偶像，都是另一架标靶，丰富而混乱的转型社会，一排排的都是祭坛与花圈。

请原谅我选用了这种文艺而飘忽的描述方式，因为我的笔力无法穷尽生活中层出不穷的偶像崇拜。张悟本、李一“神马的，都是浮云”。他们源自本土的强大迷信传统，必将薪尽火传，普通人听其言而信其行，聪明人听其言而利其行。利益各方环环勾连，一个丧失了规矩，又未建立起规则的社会，宗教或学术或传统，也不过是扮演着古老而新鲜的角色：求仁得仁，心诚则灵，你说是三聚氰胺，我说是止痛灵丹。有它们的世俗化功能，就有它们的世俗化生存。

他们相信民主宪政，他们相信大国崛起，他们相信公民社会，他们相信话语权力。又是鲁迅，他说：你把黄金世界许给他们的子孙，

又把什么许给他们自己呢？给他们世博，让他们在烈日下排好几小时的队；给他们亚运，让他们私车限行，狂挤免费的地铁与公车；给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盛会，给他们一个又一个的盛世，让他们忘掉房价高企，让他们忘掉股市低迷，让他们忘掉 CPI 疯涨，让他们忘掉幼儿园的血迹。

有信才能有忘，迷信之盛，或许这是一个主因。

失信之痛

这一年，《蜗居》对接上了《蚁族》。“蜗”、“蚁”，成为解读中国的一个人口。

从表面上看，“蚁族”与古已有之、于今不绝的“北漂”、“上漂”相似度很高，低收入、出租屋、聚居点、拥挤的公交、无结果的感情、平安电话里的谎言……将“蚁族”视为一种“80后”群体自恋或传媒的逐异命名，似乎也未尝没有道理。

外省青年来到大城市追寻梦想，一次机会来自十载苦等，一人成功基于万人失落，本是所有都市社会的更新模式，科层体制的活力源泉。他们现在是底层与边缘，但通往上流与主流的路是畅通的，只要你有能力、肯学习、够勤奋——这是主流意识形态给予的承诺，也是维持稳定有序的社会水泥。

“蚁族”的特别，或许在于它是一种群体的“被边缘”，而且蚁族面临的是“结构性”的边缘处境。他们的生成，来源于“教育产业化”生发的大学扩招，来源于城乡差别的无限制扩大而非社会主义理想的逐渐消灭，来源于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成功学鼓吹，还来源于中国大多数家庭资源畸形集中“千顷地一棵苗”的教养方式。而他们遭

遇的，是吸纳能力远低于欲望增长的城区扩张、都市扩容与中产阶级扩军。

对于“蚁族”而言，“逃离北上广”根本不是一个选项。回去干什么呢？父母都已下岗，而且一生的希望都在自己身上。人脉资源有限，而且所学更无用场。当年，他们借助网络将视野扩大到故乡之外，他们借助高考将自己迁移到了梦想的别处，他们来过，见过，爱过，岂能就此罢手，暗淡收场？

幸或是不幸，今日的边缘青年，已很难将个人之痛与家国之恨融为一体，借助时代的呼声来寄托内心疯长的渴望。资本社会有效地瓦解了颠覆性的思想资源，代之以个体奋斗的成功询唤。因此，似乎看不到“蚁族”会成为动荡之源的迹象，他们的命运也被旁观者与当局系于许多细枝末节的调整与改进之上，如建立公租房，美化社区，提供就业咨询。这使得他们的处境，似乎比前辈们更加前景灰暗。

有人说，“蚁族”的生活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悲情。左宗棠与毛泽东年轻时都被赞许为“身无半亩，心忧天下”。“蚁族”忧不忧国不好讲，心怀天下是肯定的，天下就在出租屋或网吧里的十余寸的屏幕里。比特世界里的居民，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容易找到虚拟的满足，与短暂的快乐。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因果链：只要魔兽不停服，贾君鹏就不用回家吃饭，谁喊也没用。当“中国工人”被评为《时代》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时，“蚁族”也在世界图景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他们也可以改变世界。

可惜，当富士康的“N连跳”、佛山的罢工潮连续袭来，当“我爸是李刚”从大言变成实事，当上海胶州路的大火吞噬老少五十八条生命，我们才发现：对这世界的想象，或许还是太傻太天真，月亮背面，有我们梦想难及的残酷与黑暗。生活之残忍，在于希望的断绝。

世界杯，《老男孩》，《春天里》，只是这残忍生活中的廉价麻醉品。

当农民、农民工与他们的后代，还走不进这貌似繁华的都市，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，已在盘算着改换与撤离。穷人对未来没有信心，因为“进不来”也“回不去”，富人对未来没有信心，所以“留不下”也“跑得快”。

在中国谁会过得快乐，安全，信心十足？我问出这句话，自己都吓了一跳。

这一刻，我突然希望自己是于丹的信徒，是李一的信徒，是盛世之中的又一个小林，又一个贫嘴张大民。